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 变迁及其绩效研究

Study on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Modern China

兰日旭 著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 变迁及其绩效研究

Study on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Modern China

兰日旭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兰日旭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0-17328-3

I. ①中… II. ①兰… III. ①银行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6872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

兰日旭 著

Zhongguo Jindai Yinhang Zhidu Bianqian Jiqi Jixiao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000

定 价 58.00 元

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兰日旭博士与我相识多年。那是在 2003 年，筹划写作《中国金融史》时，他除承担清末、民初两章外，还承担大事年表的编撰工作。接触中，得知他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就来我校经济学院工作，且体会到他为人随和，治学勤勉，乐于思索，有所见地。2004 年，他的博士论文经修改补充，以《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的书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今年适逢十一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刚刚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全国人民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改革开放，金融界人士为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而畅所欲言、出谋划策之际，他送来《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的书稿。我作为第一读者，只是对中国金融史感兴趣，学习中常为一些问题困扰，有时同他一道交流想法、切磋讨论而已。他要我写点什么，我想借此机会谈点感想，或是想法，不揣谫陋，向作者及读者请教，谅亦无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与之配套。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金融理论与金融企业制度，同时还要认真总结中国近代的金融思想与金融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把握住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我常有一头重一头轻的感觉，或许是出于职业上的偏颇，总有一说到中国金融史，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或兴趣索然，以为不就那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了的感觉；甚或以为中国除了高利贷，此外还有什么值得去研究讨论的，自然更没有必要下功夫浪费时间了。岂料这种近乎无知的简单否定，或者说无所谓，所带来的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全盘西化，就可能是盲目的自尊自大，反对排斥一切西方先进的制度、机制、工具，乃至其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

我们说金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就连总结我国近代银行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也绝非易事，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成就，

且不说大家的认识是很难一两下就达成共识的，尚需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行总结和概括，只有经过这样的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或许才能接近或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兰日旭老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出了他的辛劳和才智。为了这一课题，在三四年前，他就已耗费了不少心血，完成讨论稿《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又经过近几年的补充、修订，今日方告完竣。诚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言：“力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银行业在近代的公司制度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综合性研究，展现其演变的过程、特征及一般性的规律。”他所做的是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件本该早有人去做，但又为许多人所不屑于去做的工作。为了总结过去，要去查阅大量史料，长久地坐冷凳，在人们费事、不解的目光下静心苦读，一位三十几岁的青年学者，在趋之若鹜的名利磁场干扰下，在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的生活、工作重压下，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淡定和信仰的支撑！我似乎看到了希望，感到我们青年人的执著与可爱，我于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倍感欣慰与钦佩。

说到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话题，就必然引出中西交流问题。我以为中西方的交流从古至今未曾间断过，其间可能出现过短暂的阻隔或间断，然而从未形成趋势或出现断层。一旦合法的、公开的交流遭到取缔或禁止，也不乏地下的或非公开的暗流涌动，只要时机成熟就会以合法公开身份亮相。自然，古代的交流与当今的交流及全球一体化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然而亦非想象的那样闭关锁国政策所能封锁得住、小国寡民思想所能禁锢得了的。到了近代，在西方先进文化、科学技术造就出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面前，一切思想观念、制度法规都显得是那样的丑陋陈旧，以致不堪一击，不值一提。自西方文明发达以来，一切价值判断、游戏规则都唯西方是从，从人的生存权，什么民主、平等、自由，什么科学反科学，生态平衡不平衡，环境保护与破坏，什么战争与和平，及至什么通货膨胀与紧缩，汇价的高低，什么金本位与管理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无不操在那么几个大国，甚至某个大国手里，成为它们随心所欲、任意摆布的玩偶。可是一切人类文明史，至今绝不是几百年的事，也不是五六千年那么简单，人类今后的发展也绝不是千百年的短暂一瞬。因而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绝非朝朝暮暮，随意可以摧毁或轻易否定得了的，亦非某些人自暴自弃或自我否定得了的。中国文明绵延了几千年，内在的文化基因使之在中国及东方文化圈甚至更为遥远的地域发挥着影响作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结

构、原则、机制、作用在中国的现代银行企业制度里仍会保留其合理的内核因素。这种内核因素的留存使得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得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否则它绝不会持久地存活，并真正发挥出巨大作用，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西方在华银行也得入乡随俗、产生变异，否则亦会遭到排斥，乃至无法生存，更不必说发展了。

在对待西方理论方面，我以为要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略而不论），一种则是不加区别，模糊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只讲共性，认为既然是金融机构，那么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相同之处。这固然不错，然而在现代金融机构与古代金融机构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西方银行与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它们不只有中外之别，还有古今之别，它们在组织结构、资本实力、经验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所以钱庄票号会被概括出封建性、保守性、高利性，还有什么买办性等特征。在国外它们被译为银行的情况下，国内也会有人愿意附和这一称谓，然而在科学研究时，我以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有欠妥当。因为我们不该被轻易拔高或随意混淆概念所忽悠，相反我们应该避免以此来抚慰那颗因百余年来中国落后挨打，饱受屈辱、摧残和伤痛的不平和的心。细想这是否有如鲁迅笔下的阿Q，自我欺骗，自我麻痹，有百害而无一利。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被人打怕了，或许是出自对西方的服膺，只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美的、先进的，因而谈到金融，似乎中国简直是一无所有、一片空白，只能全部引进，照抄照搬了，要研究探讨就只有眼睛向外，而不必向内，否则就等于是瞎耽误工夫。其实，兰老师说得不错，“我们要真正实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高其经营效率，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国银行过去的做法。”这或许就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兰老师的思路 and 眼光值得肯定、支持和赞赏。

真要做到知己，并不容易。古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就迷在“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每个人都该清醒地回答：该怎样认识本民族、国家、社会？她的长短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几千年的货币信用发展沿革史，其内在的合理成分又到底是什么？近代以来，我国银行现代化有哪些成功和失败之处？我们应该坚守的信念和做法（政策、措施、法规、制度）是什么？应该尽快放弃、纠正的理念、做法又是什么？……在未搞清楚以前，切忌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这种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远的不说，在我们推行一种新做法之前，往往会把它吹成一朵花，等到要改变时，又会把它说成是一堆豆腐渣，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科学的，或者说是反科学的。我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对其本身，及与之相

关的环境条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从事实出发，做出完整客观的判断。今天特别要注意，要使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不出现大的失误，就万不可说，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完美的，只要是我们自己的就必定是落后的，就必须被淘汰。其实，我们对人家的东西了解得再透彻，也往往只知其皮毛，或者说只是一知半解，更何况其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同，盲目推崇、迷信，肯定要吃亏上当。加之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家境都说不清就想下车，那就很可能导致正经的传统未发扬，本不该抛弃的反倒会被无情地抛弃了，本该抛弃的倒会被继承并发扬着。国门洞开，若只知迎合外而不知适合内，一股脑地移植进来，只怕会如引进外国种子时连同病虫害一道引入，所以我们务必谨慎从事。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纳税人（法人和自然人）共有的财产，要为纳税人服务，岂有处处事事收费、储蓄存款对储户负利率的道理，怎么可以只考虑银行自身利益而不顾及是否损害他人，特别是自家主人的利益呢！且储蓄存款是银行的包袱还是不涸的资金源泉，亦绝非小事一桩。

兰老师以利益相关为核心，以与银行利益的近疏为线索，“按照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综合委托—代理等理论分析中国的银行制度变迁，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为当前银行制度建设提供借鉴。”这种有益的尝试，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尚不为多。特别是专论中国近代银行公司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当是破冰之举。他以唯物论为导向，借鉴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从银行制度渊源、银行制度框架、融资结构、治理结构和约束激励机制等方面，渐次深入地考察分析了制度嬗变，效率方面则从微观理论与宏观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灵活与适度的结构性启示。整个银行制度的嬗变是渐进的，中西融合的，体现出浓墨重彩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现代化之路。

兰老师做了件大好事，我希望同仁们及关心银行改革的人们都来读一读，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亦能提出来，以启发思索，使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向着纵深发展，日臻成熟。

姚 遂

2011年4月2日于中央财大东塔楼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渊源	16
第一节 传统金融组织结构的演进	16
第二节 国外新式金融组织的衍生	33
第三节 中国新式金融组织的诞生	49
第二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组成之一：融资结构	60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的融资结构	60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股权结构的特征	85
第三节 中国近代银行股权结构的创新——官利制度	96
第三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组成之二：治理结构	113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治理结构的演变	113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治理结构的特征	143
第三节 中国近代银行治理结构的延伸——连锁董监制	147
第四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组成之三：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159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内部激励机制	159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166
第三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内部信息披露机制	175
第五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组成之四：外部约束机制	181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经营的法制环境建设	181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外部监督机制	190
第六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嬗变	206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商业化趋势（1914~1927 年）	206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官办化回归（1927 年以后）	216
第三节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联合与兼并趋势	226

第七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之一：	
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	236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效率：理论分析·····	236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效率：案例分析·····	245
第八章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之二：	
宏观层面的实践分析·····	259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对工商各业的贡献率·····	260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制度性冲击·····	269
第九章 灵活与适度：对当今银行改革的启发·····	278
附 录·····	285
参考文献·····	305
后 记·····	314

序 言

公司制是伴随公司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现代公司最早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伴随着魏源《海国图志》一书的介绍而进入。那时，在国内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分布在国内的企业组织大多为独资、合伙两类，那些一直被国人引以为豪的票号，虽然萌生了某些现代公司的成分，但本质上仍未脱离合伙制的范畴，推行忠实为体、勤俭为用的理念。票号这一组织形式尽管也造就了庞大的基业，拥有横跨大江南北、国内外的经营网络，但内部治理的缺陷、创新精神的不足、服务社会理念的缺乏和外部环境的不靖，其最终因无法顺应时代潮流而湮没。然而，它们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推崇的经验，有很多方面至今仍在沿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号召人们向票号学习。票号作为中国企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没有直接过渡到现代股份制企业，但其原有的做法却给后来成立的银行以众多的启发，在中国银行业采纳西方现代金融组织的过程中为其铺垫了经营人员、资金、技术等必要条件。中国近代银行建立的国内基础与国外新式的金融机制使它们能够很快适应剧烈变化的形势，展开与国际银行业和中国原有传统金融业的多重竞争，并最终实现对外资银行、国内钱庄等的替代。过去银行业的成就，不但与银行所处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①，而且还与银行制度结构的逐渐完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们虽然以传统金融组织的人员、资金与技术为基础，但在实际运作上却逐步摒弃了早期组织的（股份）无限、均分利润等做法，建立起股份有限、资本厚实的规范化的公司制度结构。

当前，中国不但面临与国外金融机构如何相处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如

^① 如银行与政府、同业、金融市场、社会其他各业的关系，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这点，可以参见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一书第四章的内容。

何改善国内金融机构以适应全球化、增加银行整体竞争力、降低银行风险等问题。回顾过去的经历,跟吸纳国外同行的经验是同等重要的,毕竟,过去的经历是在被动条件下做出的,但中国的很多金融机构却做得相当出色,它们在早期“委曲求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通过银行业自身的开放理念、吸纳传统金融业已有经验,逐步把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企业组织形式等融入中国特有的国情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公司制度,最终促使中国银行业壮大并超过国外在华金融机构的实力。今天,回顾和总结中国银行业过去走过的曲折经历,必将对今后银行业的改革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一、问题意识

黎澍先生在其《集外集》“我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文中曾指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的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历史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① 那什么是历史发展规律?什么是历史真相?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尽量客观地看待过去发生的一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②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们的种种研究、实践就成为无源之水,极易出现民族虚无主义的趋向。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建立中国经济学,那我们就更应该立足中国的实际,在长远的经济发展历史长河中汲取必要的养分,从中抽象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规律,毕竟,“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③ 而外来的经济学理论,它是建立在所在国的经济实践之中,是适应它们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诞生,对中国经济建设而言,就只能把它放到中国的经济背景下,加以检验和修正,在中国经济已有基础上加以吸纳,而不是像当前某些经济学家那样,把它们奉为“经典”,照搬照套,结果造成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中一些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毕竟,中国经济的发展成熟有自身的因果演变过程,必须以自身的经济史

① 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②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31页。

③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0页。

实为基础,去思考、制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而处于改革大潮之中的银行业,亦是如此。

金融是经济的中枢,银行则是经济发展的血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曾引用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此话虽然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愈显真知灼见。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序幕,逐步把银行的财政面纱揭开,将其还原为真正的银行,使其业务经营、内部结构等按照市场化来操作,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发展道路。但今后究竟如何走,我们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不但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而且还需要全面地回顾中国银行业走过的道路,认真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取向,我们在探索过程中,应当以中国社会历史为理论的检验器,尽量减少风险成本,增加银行经营效益。通过对历史上相关银行制度的研究,扩大我们的视野,增加对当前我国银行改革的问题意识。“如果经济理论对经济史证实没有帮助的话,理论本身很可能有缺陷。但如果理论能够阐释过去,它可能也能阐释当前。”^①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应该比分离好,尤其是国外理论的应用与当前中国实际和银行历史的结合比分离更好。这也是唯物史观在经济史研究与实践中的深刻体现——新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原先形成的银行体系必然受到国外金融业的强烈冲击,一味依赖政府、以国家信用替代银行信用、以行政命令替代公司制度、采取高度垄断等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这样,国内银行业的改革自然就要涉及银行制度结构,要构建一套协调各大利益主体的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意识、加大信息披露、防范风险,而要实现这个改制,其实质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厘清产权关系,确立银行自身的发展目标。当然,要真正建立适合中国的公司制度,我们除了要认真学习和吸纳国外的先进经验外,同样需要了解中国过去的做法。因为一个国家的银行制度,其实是本国一系列社会制度、习俗等变量的函数。不但在不同国家,而且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时期,该

^① A. K. Cairncross, 1989: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II.

函数中的变量构成及其形式都会不同。因此,我们要真正实现国内银行的改革,提高其经营效率,就有必要深入了解国内银行制度的过去做法。“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①中国银行业过去所形成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既有以市场化为核心动力进行诱致性变迁的制度,更有以政府为核心动力进行强制性变迁的规律。每一种路径选择下的银行制度的构成、演变,都体现出了该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走向,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银行业的整合,虽有负面的影响,但更有正面的效应。对此的研究不但能够丰富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的理论宝库,为今后改革提供某种借鉴,而且对该类问题的探索还能大大增强我们对现实改革的问题意识——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以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为依托,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之路,决不离中国实际而谈改革发展之路。

现在,中国的银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银行改革中,改革者呈现出完全偏好国外理论和实践,轻视国内银行过去和现实背景的做法,具有很大风险,并引起人们的诸多质疑,如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市场换技术”所引发的“贱卖论”、银行制度改革中的“国有”与“民营”的争论、银行服务质量欠缺与中间费用大幅提升所引发的民众的广泛质疑。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中国银行业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漫长道路,其中成就非凡者众多,积累的经验也很丰富。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初也处处以外国银行理论、实践标榜,但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认识后,亦无不以中国自身的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等背景为依托,走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如此规律应该引起当前改革者的反思,避免“似曾相识”的回归。当然,中国的银行发展改革中应该参考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和实践,但不应以此作为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制度,如产权和司法体系,是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②

① [美]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7页。

② [美]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43页。

二、研究概述^①

目前,中国的银行制度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一个行业研究的热点,一大批相关性论著也应运而生。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们主要集中在以票号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②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银行制度^③部分,而近代银行制度部分的研究涉及较少。

有关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研究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前与成立之后存在很大的区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银行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制度类型、业务及银行专业化方面,如周葆蓁的《中华银行史》^④对当时国内各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进行了分析,其内涵则集中在不同类型银行的法律或则例方面;1943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各国银行制度》则直接指出了“考各国银行制度,每因国情不同,而产生之制度亦异。按制度二字,普通作系统解。即一国以内之银行,其上有一中心机关,其下以商业银行为最普通,次为农业、工业、实业、汇兑、信托、储蓄、不动产等特殊银行。”^⑤之后,按照银行系统的内涵,对各类银行的制度进行了分析;陈振骅的《货币银行原理》^⑥一书亦是从银行类型的角度对银行制度进行了阐述,而涉及的银行制度本身的内容基本与上述两书所提到的一样,仅仅描述了在此期间政府所公布的相关类型的银行法律制度;马寅初的《中国之银行制度》一文则从中央银行制度的角度对发行统一、国库统一、利率降低、汇兑率统制、钱庄之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⑦;一些国外的研究也与此存在相似之处,如〔日〕金融制度研究会的“中国的金融制度”。^⑧

① 有关银行史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第6~29页)的学术思想回顾部分,本书仅仅对2005年以后的部分加以补充和分析。

② 比如刘建生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张桂萍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以及孔祥毅、黄鉴晖、张国辉等的论著,都是以票号为对象展开结构性分析的。

③ 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专著、文章很多,成为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

④ 周葆蓁:《中华银行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七(1918)年版。

⑤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各国银行制度》,民国三十二(1943)年版,第407页。

⑥ 陈振骅:《货币银行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1935)年版。

⑦ 马寅初:《马寅初经济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民国三十六(1947)年版,第28~38页。

⑧ 〔日〕金融制度研究会:《中国的金融制度》,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9。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研究的论述则超出了银行制度专业化领域,开始涉及银行制度的其他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如下几点:(1)银行股权的构成方面,主要分布在各种银行史、经济史、金融史著作的部分章节中,比较零散、不系统,尚未有专门的文章和专著问世,即使从对该问题有涉及的文章、著作来看,也仅以单个银行股权的构成为背景加以分析和论述,而不是作为一个行业展开、探索以揭示其演变的一般规律。如陈礼茂的《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①一文就涉及中国通商银行的资金来源、章程制度和人员组织状况;董昕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②一文涉及上海分行的组织机构变迁方面的内容,周玮的《浙江地方银行研究(1923~1949)》^③一文简单论及浙江地方银行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内容,以及〔美〕阿瑟·恩·杨格、〔美〕小科布尔、〔英〕柯立斯等的文章、著作;(2)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约束激励制度等方面,当前的研究虽然已经铺开,如万立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探析》^④和《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官制度的发展轨迹及其启示》^⑤、周春英的《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探析》^⑥、马志刚的《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理法律问题研究》^⑦、刘平的《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管官制度述论》^⑧和《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⑨、兰日旭的《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激励制度探析》^⑩等,但内容上主要集中在金城银行^⑪、中国银行^⑫、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① 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4。

② 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5。

③ 周玮:《浙江地方银行研究(1923~1949)》,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④ 万立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⑤ 万立明:《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官制度的发展轨迹及其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⑥ 周春英:《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探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⑦ 马志刚:《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理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1。

⑧ 刘平:《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管官制度述论》,《上海金融》2007年第6期。

⑨ 刘平:《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⑩ 兰日旭:《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激励制度探析》,《南方论丛》2007年第2期。

⑪ 周浩明:《金城银行风险管理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3。

⑫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聚兴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①等几家规模较大的银行上，尚未有专门以银行业为核心进行研究的，而从整个中国近代银行业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少，基本集中在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体系、经营运作制度等内容上，如王丹莉的《银行现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制度研究》^②，并且基本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上；（3）金融制度变迁及中外比较，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整个金融业方面，偏向于以政府功能的强弱为导向的观点^③，在实际研究中基本把银行业与保险、证券等领域综合论述，没有突出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业部分。其实，银行业是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主体，不管是机构数量还是业务活动都占据绝对的优势^④，因此，以此为核心展开制度性变迁研究，更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4）银行股份制的构成研究，基本是作为近代中国企业股份制研究的一个特例而加以论述^⑤，大多只是一般化谈及，没有系统对银行业加以提炼和综合，形成银行股份制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至于银行各大利益主体之间、行业制度演进、银行制度路径选择等方面几乎无人谈及，更没有专门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作整体研究的文章和专著。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组成部分，尽管绝大部分领域都已有人涉足，但不可否认，存在着研究分散、不系统，无法给人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和由此归纳出其演进发展的长短之处及规律的问题。如此状况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现状极不吻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改革路径的选择。当前，中国银行业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相应地，银行制度的构建自然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热点，但综观相关文章和专著的内容，不难发现是以外国银行制度理论和实践为导向引领中国银行业的内部改革，很少涉及中国银行业过去所经历的路径选择规律。如此改革趋势虽然促成了一批银行在境内外上市，但采用“资金换技术”以及股权分散等方式的做法能否真正实现改善银行内部治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等目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为此，本书力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近代时期中国银行业公司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综合性研究，展现其演变的过程、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② 王丹莉：《银行现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制度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③ 如杜恂诚：《中外金融制度史的比较与变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④ 参见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四章第一节。

⑤ 参见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以及王业键、朱荫贵、李玉、沈祖炜、王处辉、孙建华等人的文章和著作。